再訪皮村：從“農民工”到“新工人”

黃傳會 新工人藝術團 2016-10-31

再訪皮村

黃傳會

“

他們已不僅僅是“新一代農民”，他們正在向“新一代工人”嬗變；他們已不滿足於做“城市邊緣人”，他們渴望進入城市主流社會，甚至成為“新北京人”。

　　皮村，北京東五環外一個典型的農民工集聚地。全村兩萬多人口，農民工占了十之八九。一位農民工告訴我：“剛進城，我們住在三環，後來三環繁華了，房租太貴，就搬到四環；再後來，四環繁華了，又搬到五環、六環。城市變得越來越繁華了，我們卻不斷被邊緣化……”

　　上世紀九十年代，中國掀起了城市化大潮，無數農村青壯年湧入城市，尋找安身立命之所。城市化的過程，也是文化沖擊的過程。舊的身份角色失去了，新的身份角色卻未確立，仿徨、奮鬥、追尋……構成了一個精神變遷的過程。

　　六年前，為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狀態，我曾經在皮村采訪了兩天，它給我的印象是擁擠、嘈雜，卻又帶著幾分生氣。如今六年過去，皮村有哪些變化？當年結識的那些質樸且有追求的農民工，生活得還好嗎？我決定再訪皮村。

　　一進村口，在依然嘈雜和擁擠的氛圍中，一股熟悉的氣息撲鼻而來。

　　我在皮村的“老朋友”孫恒在“工友之家”等我，除了略顯老成了些，幾乎沒什麽變化。久未相見，我們言談甚歡。

　　我問：“你們的打工青年藝術團，現在還演出嗎？”

　　“演，每年都有幾十場演出。”孫恒頓了頓又鄭重告訴我：“黃老師，我們打工青年藝術團，現在已改名新工人藝術團了。”

　　“哦？”我一聽來了興趣，“為什麽要改為‘新工人’？”

　　孫恒說： “別看是一個稱呼，其實關乎我們的身份呢。”

　　我追問：“怎麽講？”

　　孫恒滔滔不絕起來：“過去，社會上都習慣叫我們‘打工者’，這是指我們是一群被雇傭的勞動者，而‘新工人’則有了主體性的含義，代表了一種主人翁的社會地位；其次，‘新工人’是我們一種自覺的訴求，也包含一種渴求創造新型工人階級和新型社會文化的沖動。”

　　從孫恒的話中，我咀嚼出了個中意味：他們已不僅僅是“新一代農民”，他們正在向“新一代工人”嬗變；他們已不滿足於做“城市邊緣人”，他們渴望進入城市主流社會，甚至成為“新北京人”。

“

打工文學可以作為一種利器，反映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對生活的看法。一些知識分子躲在高樓大廈寫作，他們不關心底層社會，由此不能代表我們的聲音。我們的文學可能是粗糙的，但卻是我們自己的。

　“2016打工春晚”在北京朝陽區文化館拉開了帷幕。

　　這是一頓由打工者自己主勺烹飪、表達打工群體在一年辛勤勞作中的酸甜苦辣的勞動文化大餐；舞台上的主人是廣大平凡的勞動者，勞動不僅創造財富，也創造充滿真情實感的藝術。

　　孫恒的保留節目是演唱《打工、打工，最光榮》：

　　打工、打工，最光榮！嘿！

　　打工、打工，最光榮！

　　高樓大廈是我建，光明大道是我建；

　　臟苦累活兒是我們幹，堂堂正正做人

　　——憑力氣來吃飯！

　　在這個屬於打工者的夜晚，孫恒激情澎湃。

　　1998年，孫恒告別家鄉，成了一名流浪歌手。盡管他全身心地投入，卻越唱越迷茫。六年前，他同我聊天時，曾傾訴過當初的苦悶：“我的生活經常被負面主宰，思想經常處於無力、焦慮和痛苦的狀態。覺得活著很壓抑，覺得對未來、對人生沒什麽把握……”

　　一次偶然機會，孫恒到一個建築工地待了三天。晚上，他在逼仄的工棚裏為工友們唱歌，唱一些老歌，也唱自己編的歌謠。工友們連工裝都來不及脫，手裏端著飯盆，兩眼盯著他，那種目光與在地鐵站演唱時路人的目光天壤之別，孫恒突然明白了，這裏才是他唱歌的地方。

　　同吃同住，聽工友們講打工史，講鄉愁，講婚戀，講艱辛與憧憬。孫恒覺得自己成了他們中的一員。他還專門為一位叫阿彪的工友寫了一首歌《彪哥》，台下的阿彪聽得淚流滿面：

　　認識你的時候，已是你幹完每天十三個小時的活兒以後。

　　大夥兒都管你叫彪哥，你說這是兄弟們對你習慣親切的叫法。

　　每天起早貪黑，你說你感到特別的累，

　　可是只能拼命地幹，才能維持老少一家安穩的生活……

　　其時，孫恒結識了王德志、許多、姜國良。來自內蒙古科爾沁的王德志，是懷著學相聲、當明星、上春晚的夢想來到北京的；許多高中畢業後，在舅舅的模具廠幹過，還當過協警，他覺得“自己是家鄉當中的一只鳥，就是要掙脫這片林子、這張網；飛出來了，來到北京”；而姜國良“從電視、電影裏看到外面的世界，跟家裏的世界不一樣，就想出去看看，去掙錢”。四個都喜歡文藝、都懷著青春夢的年輕人走到了一起，惺惺相惜，志存高遠。他們成立了“打工青年藝術團”。為使組織和演出合法化，2005年7月，他們又向民政部門註冊了“工友之家”機構，孫恒出任總幹事。

　　歌曲《想起那一年》《這矮矮的村莊是我們在這城市的家》《團結一心討工錢》《天下打工是一家》《電梯姑娘》等，相聲《漂》，還有小品《我們的世界，我們的夢》，藝術團唱的說的演的都是熟悉的生活，只要工友們喜歡就行。

　　這些年來，“工友之家”在皮村建立了社區活動中心，設有法律咨詢、維權熱線、女工小組、文學小組、舞蹈班等。它要給工友一個聚會的地方，給他們一種家的溫暖。

　　來自河北吳橋的工友郭福來，每到周日晚上，都會步行一個多小時來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，聽高校的志願者老師講課。同時，他又會按照老師的要求，將自己的生活寫成作品。

　　郭福來的那篇《思念妻子的一封信》感動了身旁許多工友：

　　小英，你聽說過兩情若是長久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嗎？咱們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裝，放進背囊。到老了，不能再打工時，咱們運回老家。坐在自家的土炕頭上，一點點打開，重溫今天分居時的思念，不也是一種幸福嗎？

　　而今，創作已成為郭福來的一種生活習慣，周一、周二構思，周三、周四寫作，周五、周六修改，周日晚與大家交流。因為有了這個文學小組，因為有了文學，郭福來覺得自己找到了一種個體的尊嚴。

　　藝術團在演出過程中，越來越意識到打工文化的重要性。

　　再次相逢時，孫恒說：“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誰，孤零零的。做了這些事後，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認同，自己也是工人群體中的一分子，負面的情緒慢慢消失，逐漸從搖滾歌手的個人宣泄轉變到為勞動者歌唱，也更自信了、更有方向了。”

　　自2009年以來，“工友之家”發起並舉辦了四屆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。

　　來自深圳、廣州、重慶、香港、北京等地的勞工代表和打工詩人、民謠歌手、民眾戲劇愛好者、媒體、學術界以及皮村社區居民，匯集在皮村。在藝術節期間舉辦的“勞動文化論壇”上，打工“藝術家”們更是旗幟鮮明地宣告：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新文化運動！

　　請聽聽他們的聲音：

　　打工文學可以作為一種利器，反映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對生活的看法。一些知識分子躲在高樓大廈寫作，他們不關心底層社會，由此不能代表我們的聲音。我們的文學可能是粗糙的，但卻是我們自己的。

　　勞動文化一定是靠我們自己來創造的，要通過自己的講述、自己的拍攝、自己的歌唱來發展自己的文化，來建立自己的文化。

　　孫恒對我說：“現在我們藝術團的活動和創作在文化與價值觀上已經有自覺性了。它不再是個體的自娛自樂，目標也非常清楚，就是要承載工人群體的文化，倡導勞動文化，要幫助工人和勞動群體尋得文化上的寄托。”

“

一位學生在日記裏寫道：“每天清晨一走進校園，我的心情就特別舒暢。這裏沒有歧視的目光，只有溫暖的眼神。在這裏，我時時感到被重視、被關愛，我不會因為自己的爸爸媽媽是農民工而自卑……”沈金花覺得這是孩子們給學校的最高獎賞。

　　我與孫恒經過皮村同心實驗學校，幾位學生歡快地從校園裏跑出。

　　孫恒問我：“還記得沈金花嗎？”

　　我說：“那個‘女娃校長’？記得。”

　　走進校園，沈金花迎了過來。六年不見，“女娃校長”顯得更加幹練了。

　　我有點驚訝：“沒想到你還堅守在這裏？”

　　沈金花說：“只要學校存在一天，我們就堅守一天。”

　　“工友之家”進駐皮村後，孫恒發現到處都是七八歲、十來歲的孩子在遊蕩。原來，皮村成為農民工集聚地後，他們的子女也伴隨而來。當時打工子女入學“門檻”多多，許多孩子無法上學。孫恒的眉心蹙在了一起，他自己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，知道教育對於人生的重要性，打工子女也應該享受平等的義務教育。當時，沈金花在中華女子學院讀大四，正在“工友之家”做志願者。有一天，孫恒告訴她，“工友之家”準備辦一所打工子女學校，鼓動她留下來。沈金花疑惑地說：“我自己還是個學生呢，如何辦得了學校？”孫恒說：“你不是學社會學的嗎？現在社會需要這樣一所學校，在這裏你會大有作為的。”或許是被這段話觸動，沈金花真的留下來了。因為有了這所學校，皮村和周邊的七八百個打工子女重返校園。

　　這些孩子有的從小隨父母進城，有的就在北京出生，從少不更事起，他們便被自己的身份所困擾。同心實驗學校把“愛”放在教育的第一位，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健康自信地成長。一位學生在日記裏寫道：“每天清晨一走進校園，我的心情就特別舒暢。這裏沒有歧視的目光，只有溫暖的眼神。在這裏，我時時感到被重視、被關愛，我不會因為自己的爸爸媽媽是農民工而自卑……”沈金花覺得這是孩子們給學校的最高獎賞。

　　近些年，教育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，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已經有所改善，我沒想到同心實驗學校還保留了下來。

　　沈金花看出我的疑惑，說：“打工子女上公辦學校是有條件的，要辦齊了好幾個證才行。那些剛隨父母進城打工的孩子還是無法上學，我們把自己的行為看成是一種‘教育救急’。”

　　“聽說有機會可以當公務員，也可以到香港繼續讀研究生，你為什麽選擇了堅守？”我問。

　　沈金花沈吟了片刻，說：“第一，如果我覺得做一件事是有價值的，就會很有動力；第二，如果身旁有了共同追求的人，而且越來越多，就會感覺很好；第三，如果我們有一個內心想過的生活，如果我們有一種向往，很多人在為之努力，那麽我自己也需要付出努力。”

　　一旁的孫恒插話道：“同心實驗學校三年前被關閉風潮困擾過，雖然僥幸生存下來，但估計來日不長，因為周圍村莊快被拆遷完了，只剩下一個皮村了。雖然如此，‘工友之家’活動中心天天開門，各種活動照常進行。我以為經驗可以積累，學校也許會關門，但我們的辦學經驗還在；物質的皮村也許會消失，但皮村精神還在。”

“

改革開放都快三十年了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我們聽到的大多是精英和資本的話語，很少有我們打工者的聲音。應該建一個打工博物館，把打工者的歷史記錄下來，陳列出來。

　　離學校不遠便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。這是全國第一家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。

　　我又一次走進這個簡陋、寒酸卻又發人深思的博物館。

　　墻上的一條橫幅，挽住了我的腳步：“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；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！”

　　每一件展品，都是打工者真實生活的記錄；

　　每一件展品，都是打工者內心世界的反映；

　　每一件展品，都是打工者為中國經濟發展所作出貢獻的證明……

　　廣東一位打工妹的工卡，正面是她的照片，寫著名字和年齡，背後印著工廠嚴酷而又冷冰冰的規定：上班時間不得上廁所。

　　一個烤羊肉串的鐵架子，記錄著一位工友的打工史：1992年他來北京，在頤和園門口以烤羊肉串為生。1994年，鐵架子被城管沒收，他托人用兩百元贖了回來。後來，他賣過水果、賣過煎餅，當過送報員……

　　一張照片裏，幾位建築工在聳入半空的腳手架上，自豪地打出大標語：我們是城市的建設者！

　　那是個大雪紛飛的夜晚，打工青年藝術團結束了在一個工地的演出，孫恒、王德志他們擠在一輛借來的破面包車上，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著：

　　“改革開放都快三十年了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我們聽到的大多是精英和資本的話語，很少有我們打工者的聲音。”

　　“應該建一個打工博物館，把打工者的歷史記錄下來，陳列出來。”

　　“我們不單單是為了記錄和陳列，更是為了促進我們的思考和進步！”

　　2008年5月1日，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落成。記得第一次參觀博物館時，我的心為之一震，我在這裏體會到了他們的辛勤和甘苦、期頤和盼望，他們用打工者自己的語言和思維方式，保存了其困惑、不安和認知。

　　在展櫃裏，我從各式各樣的證件中，發現了王德志當年的暫住證和務工證，照片已經微微發黃，充滿著一種滄桑感。

　　我笑說：“十五年前，你看上去像是一名童工。”王德志苦笑了一下：“可不是嗎？那時候我才十七歲，屬於未成年人。”

　　重訪舊地，我註意到，博物館增加了新內容：新工人的文化和實踐。

　　與六年前相比，我發現眼前的這幾位已經不算年輕的年輕人，變得成熟了。

　　酷愛搖滾樂的許多，對搖滾樂本身有了自己的思考：“搖滾可以很感性地表達一種憤怒，但是時間長了，憤怒也就被稀釋掉了，甚至不知道為什麽憤怒了。”

　　姜國良說：“我最初理解的文化就是上學，學文化。現在理解的文化是人的行為。”

　　王德志則對我說：“剛開始一位志願者組織我們學習馬列，我覺得很驚訝，都什麽年代了，還學習馬列？我們學習了艾思奇的《大眾哲學》，不讀不知道，一讀嚇一跳，馬列竟然是如此通俗，離我們如此之近。這是一本讓我‘發家’的書，讓我徹底改變自己。從那以後我和大家一起做事，義無反顧。”

　　這次來，我聽說三年前“工友之家”在平谷創建了一個“同心創業培訓中心”（又稱工人大學）。便問孫恒：“怎麽想起要辦這所‘工人大學’？”

　　孫恒說：“我們在為工友們提供公益服務時發現，一些年輕人上完高中或初中就匆匆走入社會，進入社會後發覺自己最缺的是就業技能。‘工人大學’的培訓和食宿全免費，志願者為學員講授電腦維修、平面設計、合作溝通等實用技能。到現在已開班十二期，兩百余名學員憑著學到的新技能，找到了新的工作。”

　　我感慨地問道：“你覺得靠你們的力量還能做多大？走多遠？”

　　孫恒充滿信心地說：“心有多大就能做多大，眼望多遠就能走多遠！”

　　夜幕降臨了。許多穿著工裝的工友匆匆趕到“工友之家”，創業培訓、法律咨詢、女工小組、文學小組、舞蹈班，“工友之家”又開始一如往日地熱鬧、忙碌起來……

　　如果說，我們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，走過了西方國家近三百年的城市化演變歷程，那麽，從農民工到新工人，還有多長的路要走？

　　讓廣大農民不斷從現代化發展中得到實際利益，而不是成為現代化的被遺棄者，應是我們城市化成敗的關鍵所在。